



第3版

本版责编、版式 袁琼璐
2015年7月11日
Email: wenhuijiangtang@163.com



东方讲坛 文汇讲堂- 历史与我们的未来



2015 望道讲读会 中国文化：从何来到何处去

谢遐龄： “三文明模型” 视角下看现代中国

6月26日下午，复旦大学谢遐龄教授做客望道讲读会第四期，主讲《从文化视角观察现代中国》，他提出的新文明观让慕名而来的听众观念刷新。

新文明观之“新”

谢遐龄主张的文明观认为当代中华文明融和了不断汇入的外来文明。他认为，人们普遍采用的“古今中西”模型是不全面的，进而他提出自己的“三文明模型”即西方新教自由主义、中国传统、东正教列宁-斯大林主义。

新文明观之“观”

在“三文明模型”的解说铺垫下，谢遐龄细致解读了中国社会的三个方面的问题。

党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功能，来源于苏俄文明，与西方现象截然不同。

首先，从社会结构看，中国是伦理社会，西方是理性社会，差别在于主导性社会关系的性质——前者是直接的，后者是有中介的。人们只看到党的政治功能，却忽视经济功能、社会功能，根源即在于对苏俄文明的淡化。“群众路线”是我国领导人借鉴苏俄文明但并不照搬的范例。

其次，从表面现象看，西化似乎顺畅进展，实际上似是而非，如法制西化下，中国人尚未达到“人格性”。另一方面，苏俄文明与中国传统的关系则不同。列宁主张“理论灌输给工人群众”的单向路线，毛泽东却继承中国传统“仁政”，主张先“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的双向路线。中西社会结构与人格性不同，根源在于“无执”与西方“坚执”的差异。

最后，从中国文化传统看，谢遐龄认为是“无执”，这与西方文明的“坚执”不同。前者强调找到无过无不及的最佳点状态，而后者强调静止与抽象。

新文明观展望未来

面对三个文明激烈冲突的现状，谢遐龄指出“现在这三个文明能不能融合，对我们来讲挑战非常大”。而这条路如何走，他认为可以转化为一个法哲学问题；其次，谢遐龄认为国人对于规则应“心存敬畏”。

“密涅瓦的猫头鹰总在黄昏时起飞”，同是哲学系和社会学系教授的谢遐龄并未在讲座中给出文明融合的明确答案，但给听众留下了许多思考空间。

（撰稿：丁怡、李念，丁怡删改于文汇讲堂微信-望道稿 2015年7月7日）

编者按：

【望道讲读会】由上海市社联发起的以讲读社会科学为主要内容的公益讲座。2014年8月书展期间启动，宗旨是“十年读书，以启学林，沉浸浓郁，含英咀华”。2014年书展共举办七期，文汇讲堂公众微信于第二天发布七场演讲观点综述，聚焦《21世纪资



- ①葛兆光谈到何为中国文化时，指出要有别国没有的特性
- ②阎步克演讲中时常插入生动的比喻例子
- ③主持人上师大影视学院青年教师姜杉知性温婉
- ④社联副主席刘世军赠予谢遐龄教授“望道”荣誉教授

阎步克： 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中 含有多少现代治理

“以岗位为中心”还是“以身份为中心”？一直是古今之惑。5月9日下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阎步克登上“望道讲读会”2015年首讲，发表了题为《中国古代的行政等级与官僚品位》的演讲。

位阶体制为政治体制服务

阎步克首先向听众阐述了古代形形色色的行政级别和官僚品位，如品、秩、勋、爵之类。他重点举例爵制——周朝的爵制，是贵族官员的身份等级。

而战国变法使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取代了贵族政治，新兴位阶应运而生，产生了“商鞅变法”下的军功爵制，这同样是一个社会身份尺度。例如，爵高一级，坟头就可以多栽一个树。

品位分等与职位分等的历代变迁

阎步克引入了行政学的“品位—职位”概念，用以观察历代品位结构变迁。

周朝的公、卿、大夫、士这个爵制，独立于职事之外，属于“品位分等”一类。秦汉秩级的性质，是职位等级，而不是个人的身份等级，具有“职位分等”的鲜明特色。体现了秦汉“以吏治天下”的政治精神。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散官、名号的泛滥现象，它们属于

本论》、邓小平、严复、章太炎、韦伯、康德、甲午前后的士人、“五四”宪法和法治中国等主题。由文汇讲堂整编的演讲内容在社会科学报上整版刊登。引发极大社会反响。

2015年，望道讲读会的主题是“文化中国：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本版删选三次微信报道以飨读者。

“品位性官号”，用来给权贵子弟提供起家之阶、晋升之位，其功能是品位性的。所以这个时代是向“品位分等”大幅度转变的发展趋势。唐代面向文官、武官，各设有一套“散阶”，标示着他们的个人级别。宋朝官僚凭寄禄官领一份俸禄，又凭“差遣”领一份职钱。前者属品位薪俸，后者属职位薪俸。这同今天公务员的工资，一部分来自职务，一部分来自级别，非常类似。到了明清，皇帝专制高度强化，品位特权也在明显萎缩。位阶体制的变迁再度反转，向“职位分等”有一定程度的回归。

当代人事经理找到古代秘方

阎步克的相关著作《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便运用“品位—职位”的模式研究中国古代官阶。另一书《中国官阶制度引论》，更将这一模式贯彻到传统品、阶、勋、爵等等的各个细部，使其研究体系化了。阎步克表示“历史研究应该体现三个层面，史料、理论、价值”，这场看似极为专业的学术讲座，辐射出的学人的治学方法、精神、视野也已经超越了演讲获取新知的单一收获。

（撰稿：赵燕磊、李念，丁怡删改于文汇讲堂公众微信一望道稿 2015年5月13日）

其它方面。比如上海道台官慕久何许人也？五角场的大上海计划是怎样规划的？三是‘重政轻它’，研究时偏重政治层面，如只知哈同是地产大亨、富可敌国，不知他同时也是大慈善家，捐款数额高达百万美元。四是‘重显轻隐’，对看得见摸得到的外滩万国建筑群呵护有加，而对比较隐性的文化遗产不敏感。像梁启超在上海主编《时务报》的活动情况，李鸿章、泰戈尔抵沪时住过的沧州旅馆发生过什么故事，礼查饭店的国际联系，等等，值得细细品味一番。”

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前提是做好研究，摸清家底。目前，熊月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外语文献中的上海（1843—1949）”，将广泛搜集有关上海历史的外文资料，深入探究上海怎样在吸收外来文化与保持自身传统之间进行再创造、具有“上海特色”的西方制度怎样在这片土地再适应、新运用等议题。他的着眼点，牢牢锁定“中国文化在全球化时代如何自处”的高度。

熊月之务过农，当过兵，勤奋坚强，毅力超人，繁

葛兆光： 重思何为“中国文化”？

在5月17日以“文化中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主题的“望道讲读会”2015年系列讲座第二期上，葛兆光阐述了“中国文化”的五个特点及晚清以来它们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挑战。他认为文明常常侵蚀文化，普遍性常常吞噬着特殊性。对此，他给出了自己态度“拥抱普遍文明、守护特殊文化”。

梳理五大特点的现代变化

葛兆光首先分析了中国文化的五个特点及其在现代社会所产生的变化——在口语（白话）成为书面语，和外来语大量进入汉语的情况下，现代中国人对汉字的理解和意义的传递已不同于传统中国人；传统的家族伦理和国家理论，在现代失去了社会基础；三教合一的信仰世界，越来越趋向于世俗化、旅游化和体制化的宗教；现代科学冲击下，阴阳五行学说渐渐退出对政治世界和自然世界的总体解释；朝贡体系与天下观念，让位于新的世界观，以及现代国际秩序。

认清目前中国文化所处困境

葛兆光指出中国文化的现状是，一方面既处在传统政治、文化、历史的延长线上，一方面又处在现代的冲击之下，体现在文化上有着双重困境。就“国家”而言，观念上，接受了西方现代以“民族”为“国家”的论述，但感情上，又倾向于历史上的以“文化”为“国家”；就“现代”而言，一方面，把西方现代国家的法律、民主、科学看成通向富强的理想途径，但另一方面又不认同西方列强弱肉强食的野蛮行径，希望另辟蹊径走出新的现代；就文化而言，一方面倾向于把自己看成东方文化的集大成者，另一方面，不仅与西方文化抗争，还要与日本文化相竞争。

用“创造性转化”应对挑战

葛兆光提出自己对文化传统的理解——首先，任何文化都像仓库里的“藏品”，是被选择的资源；其次，选择这些“藏品”时，会根据现时情况而作“挑选”；再次，挑选后还需要“重新解释”，也就是林毓生所说的“创造性的转化”。面对现代化过程中不断接受挑战的中国文化，他引用了鲁迅面对两难处境时说的一个词“横站”。并指出“横站”一词的背景，将之提升为人们面对中西、古今、新旧之间的态度。

（撰稿：李念、刘龙，朱玉婷删改于文汇讲堂微信一望道稿 2015年5月23日）

忙之余，却也喜欢写点散文。他自称曾对中国文学史下过一定功夫。其自抒性灵的文字，常见诸报端。所著《万川集》、《千江集》，收录序言、散文、札记之类篇什，较之学术经典另具况味。“按照个人秉性，我雅好历史散文，写这类文章的时候，人比较舒展。”熊月之坦言，待《上海通史》新修版完工后，自己不准再承担大型集体项目了，只专心写自己喜欢的东西。

2015年1月至6月，熊月之在德国爱尔兰根大学进行为期半年的学术访问研究，探讨命理文化。他说，古今中外，大凡变动剧烈、风险难控的社会，人们都会对“冥冥天意”保持敬畏，为命理文化留下空间，诸如占卜、星相、抽签、风水之类，其间种种耐人寻味的世情百态，大可研究。熊月之说，命理学与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哲学都有关联，大而浩瀚宇宙，小而个人心灵，未知的领域永远大于已知的领域，而未知的领域常常为命理文化留出通道。

（上接第2版）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层面综合考察，体现出一派开明、变通的格局。

1994年，熊月之牵头的《上海通史》正式立项，1999年正式出版。此一卷帙浩繁的庞大工程，系统研究了上海地区约6000年的历史。2013年，《上海通史》新修工程启动。“新版亮点在于范围更广、时间更长、内容更全、体例更为合理。”新版充实了郊县部分内容，将叙事下限延伸到了2010年，吸纳国内外关于上海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体例上则兼顾传统纪传体与近代以来的通史体两者之长。熊月之娓娓道来。面对记者“会不会将《上海通史》继续编写下去，一直到2050年”的提问，他粲然一笑，“但愿无愧时代，尽自己最大努力就好。”

熊月之对“不同文化影响下社会生活”的关注，可谓其来有自。从研究民本思想，西学东渐到浸淫上海史，他的治学脉络依稀可见一条紧紧扣联的线索；也因此，他在全球化之势无远弗届的新世纪，主持了国家课题“异质文化交织下的都市文化——近代上海

社会生活研究”，力图通过解读上海这个异质文化交流共存的大都会的历史文本，提炼出“浓缩地球村”的标本意义。“上海是个案，研究上海史有特殊价值。我最欣赏上海的现代化气质，城市管理、服务到位；欣赏上海人的宽容、守法、有章程。这个城市讲真本事，本地居民绝非真的小家子气。”

“做学术要有自己的话语体系”

跳出农门的熊月之，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把握住上海这颗远东明珠的勃勃脉动。他治上海史，强调“自己的话语体系，不跟着别人走”——“当前，我们要注意保留发扬上海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而有些研究做得还不够，我暂且归纳为‘四重四轻’的问题。一是‘重中轻外’，对外国的人、事在上海的影响关注不够，比如华东医院的前身洪恩医院是谁建立的？有什么典故？二是‘重红轻它’，对红色文化重视，忽略